

高明党史



中共高明县委党史研究室编

1992年第2期

词 二 首

——为缅怀区志强同志而作

金 缕 曲

史 金

十二杨梅别。禾未黄、残风落叶，雁啼如血。素素黑纱人聚咽，泪顿失涌泉穴。再回首、已难握别。今大显身手有日，却成为浩气冲霄阙。天闭眼，烁星灭。

满城倾数公亦杰。逆境中、矢志未绝，呕心沥血。力渡艰难过险迭，一副肝肠似铁。全付与、文坛事业。恸绝山河石崩裂，自依然、巧早谋士接。酬宿愿，继宏业。

忆 秦 娥

舒俊萍

残烛夜，青帘漫卷西江月。西江月，未拌风尘，霎别寒阙。

桂子飘飘花如雪，行舟杳杳梦亦绝。梦亦绝？音容长在，此情难却。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三日

1992年第二期

高明党史

(总第36期)

1993年2月出版

高明县现代革命史概要(三、四、五)

.....区志强 黄合萍 舒 山(1)

·专题探墨·

高明科技兴县的探讨.....何祖坚(26)

谈谈改革开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陈仕金(38)

·回忆专访·

解放初期高明县工作情况回忆.....黎方伦(48)

·广播讲座·(《峥嵘岁月》选载)

第33讲 武装民众 抗日保乡.....刘慕仁(55)

第36讲 高明人民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的建立

.....江 山(59)

第39讲 为有牺牲多壮志

——记旱冲战斗和凤凰山战斗.....杜 丹(63)

·读书点滴·(学习十四大专栏)

解放思想纵横谈.....黄绍林(67)

·革命胜迹·

文选楼.....合 萍(72)

梁家祠.....合 萍(72)

·动态剪影·

县委召开《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史》定稿会...(73)

封面题字·····	谭天度
封面设计·····	黄建强
词二首·····	(封二)
高明县革命胜迹掠影·····	(封三)

高明县现代革命史概要

区志强 黄合萍 舒山

三、艰苦卓绝的抗日反顽斗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急速转化为民族矛盾。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紧急呼吁：“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爱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抗日洪流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高明虽然没有完全沦陷在日军的统治之下，却遭受了日军铁蹄的肆意践踏。英勇的高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全面的抗战路线，高举爱国旗帜，顽强地抵御了日本侵略军的野蛮入侵。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始终不忘反共，国难当头同室操戈。高明人民在英勇抵抗日军入侵的同时，还不得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蓄意制造反共磨擦的倒行逆施进行必要的奋勇反击。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月，李守纯奉命从广西调回高明。8月，中共高明县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工委）成立（同时撤销西江工委，恢复原三小支部），李守纯任书记。县工

委直接隶属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

县工委根据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三小和力社奠定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动员各阶层民众联合起来团结抗日；并且对国民党高明当局也开展了团结、争取与合作的工作。这年冬，谭天度从南京出狱回高明疗养，他不顾伤病缠身，即刻投入到抗日斗争的行列。他与李守纯一道探望了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隐伏养病的谭植棠，共商抗日大计。同时他们又积极联络国民党高明县党部特派员陈汝芳，取得了团结抗日的共识，在高明实现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

1938年3月，高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成立，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调共产党员梁钟琛任高明县民众抗日自卫大队中慰政训员，县工委派黄仕聪、叶衍基、黄之锦等人任抗日自卫团大队、中队干部，团结教育爱国官兵，培养发展共产党员，使民众抗日自卫团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与此同时，一区（明城）、二区（更楼、合水）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以下简称青妇抗）和一区儿童抗日救国服务团也先后成立，会（团）员总计近2000人。抗日团体创办油印刊物《警钟》、《号角》，分赴全县各地举办政训班，开办工农民众夜校，还以座谈会、报告会、演剧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民众捐献钱物、支援前线，密切配合前线将士抵御日军入侵。全县各界民众同仇敌忾，众志成城。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对广东发动大举攻势，由于国民党军一触即溃，致使广州、佛山相继沦陷。很快，日军又占领了三水、南海，盘踞在西江东岸的河口至九江一

带，对高明成虎视眈眈之势。为抵御日军进犯，高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分赴范洲、秀丽和海口一带驻防，与日军隔江对峙。全县各抗日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做好应战的准备。恰逢此时，广东省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第130队、131队和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一队、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以下简称三队一团）先后到达高明。县工委对此立即作了部署，三队一团分别开赴全县各地，全面开展抗日动员和支援前线的抗敌斗争。11月间，日军分乘60余艘橡皮艇及钢甲雷船闯入富湾江面，敌船上的机枪、大炮向高明方向密集射击，来势极端凶猛。驻范洲守军在共产党员、抗日自卫中队政训员陈山的统一指挥下奋勇反击，顽强地阻击了日军的猖狂进犯。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民众的士气，创下了高明人民抵御日军入侵的典范。1938年，是日军侵华最疯狂的一年。据统计，仅在高明，日军就出动飞机百余架次，投弹数百枚，进行了野蛮的狂轰乱炸。日军还多次企图渡江进犯，均遭到驻防部队的坚决抵抗。抗日部队的每次胜利，都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激情，他们自发在三洲、明城、合水等圩镇举行募捐活动，慰劳前线将士，协助救护伤员。明城的冲坑坪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抗日模范村”。

为了肩负起在抗日战争中中流砥柱的重任，县工委在全力推进抗日救亡运动中，特别注重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指示，至1938年底，县工委吸收新党员60多名，建立了三小、小洞、水井洞、冲坑坪、明城、云良、罗丹、广东省第四战区战时工作队130队、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

务团第一队等9个党支部和布社、洞心、屏山、平塘等4个党小组。1938年11月，中共西江临时工作委员会（后改为西江特别委员会）成立，李守纯任书记（同时兼任高明县工委书记）。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以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决定，根据西江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决议，县工委于1939年3月在合水小洞村文选楼召开了中共高明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0人，代表着全县80多名党员。会议历时5天。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及组织部长陈春霖、武装部长冯扬武、妇女委员会书记谭本基到会指导。李守纯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高明党组织在革命征途上发展壮大的经验，强调当前大力发展党的队伍、坚持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和确立共产党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性。罗范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方针任务，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和抗日持久战，强调要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组织和影响、积蓄力量、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坚持抗日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高明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5人、候补委员2人），建立常委集体领导制度，李守纯当选为书记。高明县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高明地方党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成熟与壮大。

这次会议的召开还有着特殊的意义。1939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抛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实施方案。从此，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渐露端倪，其影响很快便波及全国各地的

国统区。高明也没有例外。国民党高明县县长邓公烈对县党部特派员陈汝芳早就怀恨在心，借此机会，他勾结地方反动豪绅联名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指控陈汝芳是“共产党员”。不久，陈汝芳被革职查办，被迫躲匿。当局抓不到陈汝芳，迁怒其父，将其暗杀。陈汝芳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高明公开破坏团结抗日、推行投降反共政策的前奏。是年4月，大汉奸汪精卫的亲信到西江地区活动，邓公烈秉承其旨意，蓄意制造事端，离间爱国民众同共产党的血肉关系，企图遏止如火如荼的抗日爱国运动、阴谋达到向共产党人开刀的目的。他派出爪牙四处恐吓青妇抗会员，胁迫他们“不要跟谭天度走”，叫嚣“跟共产党是危险的”，强迫青妇抗的骨干同共产党脱离关系，参加国民党。更有甚者，他暗地里开列出共产党员和知名爱国人士的黑名单，秘密布置军警，准备大肆拘捕。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高明县委及时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在提高警惕、改变策略、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斗争的思想指导下，作出了在反共逆流中还要进一步发动青年参加抗日斗争以及发展党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在政治上，坚决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诡计，遏制其勾结地方劣绅对青妇抗骨干及其家属的拉拢收买和迫害的罪恶行径；在组织上，对在本地区已暴露身份可能遇到危险的干部，及时采取撤退或调动的措施。其后，全县党组织逐步转入地下，党员干部有的以职业作掩护掩蔽下来，有的及时转移。从1939年5月李守纯调出到1941年4月，历任县委书记的有李冲、龙世雄、黄文康、陈春霖。由于调整及时，措施得力而有效，因此，

高明县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逆流中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有所发展和壮大。并且还开辟建立起更楼、合水的抗日基地，建立了明城、合水、更楼3个区委。为了进一步掌握抗日武装，县委还先后派出共产党员黄之锦、陈耀基、黄峰等人打入县抗日自卫中队，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并在中队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培养了一批爱国士兵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全县共发展党员40余人，进一步壮大了党的队伍。

1942年5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粤北一带出现了破坏中共粤北省委、拘捕省委主要领导人的“粤北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区特委及时向高明县委传达了事件的真相及中共南方局的有关指示：除沦陷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时局急剧逆转的形势下，高明党组织又进入了一个更为严峻的斗争时期。高明县委经过认真分析，认为：高明虽然是国民党统治区，但党组织基础好，基层支部扎根农村，党员土生土长，日夕相处，社会关系单纯。因此，高明可以不必停止组织活动。当然，县委根据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也分别作了具体安排：身份已暴露的立即调离；未暴露的有的以教师职业为掩护，有的打入国民党乡保政权，以“白皮红心”的形式从事抗日工作；县委也从1942年9月起，县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首任特派员郑桥。在郑桥的带领下，高明县党组织再一次取得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斗争的胜利。全县党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与锻炼，党的民主抗日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1944年8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粤汉、湘桂铁路线，沿粤中、西江分两路向肇庆、梧州进犯。高明是日军的必经之地。日军犯境在即，国民党顽固派、高明县县长钟歧却望风而逃，携家眷、县警远远躲往老香山一带。为抵御入侵之敌，中共中区副特派员郑锦波与中共高明县特派员冯华号召全县各党支部组织发动群众，村村建立抗日自卫队；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竭诚合作、一致对敌。为武装自卫，党组织把钟歧逃跑时藏在合水瑶村的枪械悉数分发，装备抗日队伍；并把平塘、蛇塘、泽河、塍锦、歌乐等村粮仓打开，向群众分粮。瑶村在成立武装抗日壮丁队的同时，把钟歧留藏下的文件，册籍取出烧毁，以防落入日军之手。9月中旬，日军分两路入侵高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各地自卫队纷纷奋勇截击，尤其是常安乡和水井洞在田村迳的进行截击。这些阻击虽然没能阻挡日军的进犯，但却迟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

日军离境后，钟歧返回明城。他不思安抚民众，反借口“物资枪械被盗”，逼迫瑶村赔偿损失800万元（折谷2万多担），责令开仓分粮的村庄索赔稻谷数十万斤；而且，对更楼、合水地区大举“清乡”、“清奸”，敲诈勒索。

钟歧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县民众的极大愤恨，也激起了爱国士绅的愤懑。对钟歧不抗日、专反共，肆意镇压抗日爱国民众的反动行径，高明党组织决定领导群众与之进行斗争。一方面，先后派出一批共产党员深入瑶村、平塘、小洞、泽河等村，向群众揭露钟歧的罪恶阴谋；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士绅的支持和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人士。知名士绅曾襄廷就是这样加入到高明人民

驱逐钟歧的斗争行列中来的。10月16日，高明二区联防委员会(对内称“倒钟委员会”)在更楼圩永棧酒米铺宣告成立。委员会推举曾襄廷为主任，设委员13人。同时，还成立了高明二区联防总队，泽河村曾日如任总队长，共产党员黄仕聪任副总队长。之后几天，全县各地四处都张贴出声讨钟歧的“倒钟檄文”，一场声势浩荡的倒钟运动迅速掀起。10月21日，钟歧令高明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潘维尧率1个中队和西江江防掩护大队机枪第3中队(又称“水雷队”)进驻合水圩“清乡”、“清奸”。关键时刻，在水雷队享有威望的少尉排长沈鸿光(郁南人，原是共产党员，曾任东莞人民抗日武装常备壮丁队中队长。曾离队回家，后迫于生计参加国民党军队)策动另两位排长劳光、蔡忠率部30余人起义。起义成功后，沈鸿光在合水圩向群众发表抗日演说，并以抗日游击队的名义遍贴抗日标语，以便尽快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郑锦波、冯华很快便会见了沈鸿光，对他回归革命队伍、对起义官兵能弃暗投明加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行列，表示热烈欢迎。水雷队起义，推波助澜，更加壮大了倒钟运动的声威。10月23日，人民武装3000多人云集新圩，推举黄仕聪为攻城总指挥，并制定了“攻打明城，打倒钟歧!”的最后行动方案。翌日，人民武装兵分三路在水雷队的密切配合下，直捣明城，下午2时许攻占县署，会师于文昌塔下。遗憾的是，钟歧脱网而逃。事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不得不表示：“钟歧贪污成性，激起公愤，应予撤职。”倒钟运动取得了胜利，举县为之欢腾，这是高明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复制造反共逆流进行强有力反击的一次最有影响的壮举。

倒钟运动胜利后，郑锦波立即赶到新会县向中共中区纵队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建立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的建议。随后，中区纵队派中区军事特派员郭大同和几名连排干部与郑锦波一起来到高明。他们以小洞为中心据点，组建人民抗日武装。11月10日，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简称第三大队）成立大会在小洞梁氏宗祠召开。大会决定：郑锦波任政治委员、黄仕聪任大队长、沈鸿光任副大队长、劳光任参谋长。第三大队下设两个连：一连（长江队），连长谭秉国；二连（黄河连），连长叶衍基。大队编员140人。

第三大队的建立，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月22日，在中区纵队政治部主任刘田夫的指导下，在小洞梁氏宗祠召开高明二区军民代表大会，来自更楼、合水及高要、新兴两县边界的各村士绅父老和各界代表共200多人参加。大会宣布成立高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高明县第二区人民行政委员会。选举阮贞元任主席（区长），陈殿钊任副主席（副区长）。新成立的二区人民行政委员会以“抗日、团结、民主、进步”为施政纲领，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大力发展生产。

第三大队的组建和二区人民政权的建立，激起了国民党高明县继任县长陈斗宿的极度不满与恐慌。12月30日，他纠集国民党军158师、鹤山何柏森部、高要廖强部并本县国民兵团等2000多人进剿小洞，企图一举摧毁新生的抗日民主基地。党组织及时获得情报，部队主力和政府机关迅速转移。但是，国民党顽军蜂涌进村，肆意奸淫抢掠，纵火烧屋。当日，被毁房屋386间，抢杀耕牛26头、生猪

300多头，粮食衣物几被抢烧殆尽。两日后，顽军分四路尾随进剿，双方在癞狗山发生激战。第三大队在中区纵队第一大队的密切配合下，歼敌30余，迫使顽军溃退。这是抗战时期，高明的人民武装被迫与国民党顽军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正面交锋。

1945年1月10日，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通电成立。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以下简称三团），团长黄仕聪、政委郑锦波、副团长沈鸿光、参谋长劳光。三团的任务是在高明、高要南部、新兴东部、鹤山宅梧地区活动，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屡调军队摧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罪恶行径，决定予以惩罚性的反击。1月23日，调集一、三团300多兵力出击明城，战斗半小时，攻克全城，歼国民党县警中队和自卫队百余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接着，打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200多人。战斗结束后，三团在城内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及残害抗日民众的反动面目；鼓舞民众更加团结一致，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这一年，全国的抗日形势逐步好转，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把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大规模的抗日反击阶段就要到来。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在这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仍将矛头极力指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高明，国民党顽军非但不接受以往的教训，反而反复地寻衅、制造事端。尤其是国民党顽军158师所部各团队，不断袭扰三团在合水、更楼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基地，先后在这一带发生了独岗、旱冲、凤凰山、狮山等一系列大

小战斗。抗日军民针对国民党顽军的反复进剿，配合三团将士奋起反抗，给来犯顽军以沉重的打击。党的好战士、高明人民的好儿女陈殿钊、陈春霖、陈定、陈妹、邓少珍等英烈没有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却倒在国民党顽军蓄意反共、制造流血冲突的枪口之下。6月21日，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刘田夫和一团政委谭桂明随三团部从恩平到老香山召开干部会议。24日又遭到国民党顽军广东省保警第八大队7、8百人的偷袭，双方发生激战。此后，刘田夫带领大部队跃出外线对日作战。于是，三团跟随开赴江门、新会前线，与二团会合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高明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夺得最后的胜利。

四、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面临着和平统一建国与重罹内战之祸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与选择。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打着和平的幌子加紧策划内战，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实行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建设新中国。1945年10月，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达成“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可是，不到一年，即1946年6月，蒋介石就背信弃义，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内战由此全面爆发。

中共广东区委坚决地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

持斗争的同时，注重保存武装、保存干部，做好长期打算，准备将来的合法民主斗争。新成立的中共中区临时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区特委）向所属党组织和武装部队进一步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精神，确立了两方面工作重心的转移：即山区游击区转向城市、平原及交通要道地区进行合法的民主斗争；武装部队由较多的集中活动转为结合群众、结合生产的分散活动。高明人民武装在中区特委的具体领导下，采取隐蔽的武装斗争形式努力不懈地坚持自卫斗争。

1945年10月，两路国民党军对高明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进攻。18日，159师476团长驱直入高明更楼、合水地区；26日，156师467团伙同开平、鹤山、高明、高要及新兴5县国民党地方团队约3000余人举围攻老香山一带，对抗日老区实行“清乡”、“清奸”。其中，仅小洞、平塘、布社和洞心等村就先后被“清剿”17次，数十人被杀被捕、75间房屋遭焚、掠走财物折谷达70余万公斤。坚守在老香山一带的三团全体指战员针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坚决而灵活地执行了中区特委的斗争策略，分散村野，坚持斗争。在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以野菜充饥，白天隐伏在密林深处，夜晚出来四处活动，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设法冲破围剿与封锁。10月25日，三团团长黄仕聪在率领全团向云雾山转移与二团会师途中，因带病行军，不幸被捕，解至驻江门国民党军第64军军部。12月13日英勇就义。

在严酷的斗争形势面前，1946年1月中区特委任命梁文华为中共高明县特派员。梁文华以单线联系的方式先后接通了小洞、高村、水井洞、布社、冲坑坪以及高要的鳌

头、新兴的杜村、鹤山的合成等地的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并且恢复了高明县一级的党组织与领导人。4月，中区特委又进一步指示：“保存力量，保存骨干，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且，统一部署了部分武装力量的北撤事宜。5月，三团在吴新、伍真的带领下奉命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省。留下来的12人在梁文华的直接率领下紧密依靠当地群众及地方党组织坚持秘密武装斗争。这一时期，国民党进一步加紧对革命老区“清匪”、“清奸”，实施五户联保，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梁文华则率领部队化整为零、分头活动，设法保护堡垒村，建立秘密联络点。5月15日，武装部队成功地袭击了更楼警所，俘获警员24人，缴步枪24支及一批急需物质。一打更楼的胜利，缓解了当时的饥荒之急，鼓舞了战士的斗志，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党组织仍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这次战斗，也是武装部队由被动的隐伏活动开始转向主动反攻的转折点。8月，中区特委又委派郑靖华任高明县特派员，进一步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郑靖华抵达高明后，鉴于当时的特定环境，决定武装部队与地方党组织暂时分开进行活动。梁文华全面负责新高鹤地区的武装斗争；郑靖华致力于地方党组织的各方面工作。此后的一段时期，武装部队改以“灰色面目”出现，依靠群众，以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形式进行对敌斗争。“灰色面目”的武装斗争策略，在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是完全必要的。入秋，李法、梁文超等人先后从台山调入新高鹤地区工作。当时武装部队供养奇缺，李法在开平的水井一带开办小农场，租了水田三、四十亩，翌年秋收谷万余公斤，基本解决了部队供给的燃眉之急。结合群众，扎根群众，积